

“主义明确”:蔡和森对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认识和分析

林绪武,常 华^①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宣传家,他较早总结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历史,分析其错误、危害及形成原因,坚决与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坚定地拥护马克思主义,为党内克服和避免机会主义的错误,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贡献了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仍要以史为鉴,坚决克服党内“左”的或右的错误干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蔡和森; 早期机会主义; 陈独秀;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2-0091-07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宣传家,为党和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蔡和森明确提出了“主义明确”的建党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蔡和森坚定地拥护马克思主义,较早分析和总结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危害及形成原因,坚决与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为党内克服和避免机会主义的错误发挥了作用,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贡献了力量。但是,学术界有关蔡和森对机会主义的认识问题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主要以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为中心,通过文本的解读,以期更好地展现蔡和森“主义明确”的建党主张和对党的理论贡献。

一 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

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出现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这次大会是共产党“向资产阶级让步的开始”,也就是说党内机会主义出现的时间是1926年1月,所以,蔡和森说在“五卅”时期,“党的上级机关尚不存在机会主义”^{[1]82},共产党并非“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产物”^{[2]72},批驳了“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1]77}。而党内早期机会主义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蔡和森指出其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指出了早期机会主义放弃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错误,即“抬轿子”论。中国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究竟是由资产阶级领

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基本而重要的问题。对此,早期机会主义犯了严重错误。陈独秀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3]因此,早期机会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实力抱极为悲观失望的看法和放弃领导权”,默认资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主人,应当“坐轿子”,而无产阶级应当“抬轿子”。^{[1]88}这就是说,机会主义居上风的党中央把广大工农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领导权拱手交给了资产阶级。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应承认国民党的革命领导权”^{[1]106},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要在事实上抓住群众,形式上拥护国民党的主张并不要紧。陈独秀还认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如若没有资产阶级领导,便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即使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被打倒的阶级也有恢复的可能。蔡和森强烈谴责这种论调是“热烈地辩护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4]1011}

共产国际从第二次全会起就说明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必要性,并且一以贯之地强调。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面临两条不同的道路,即资产阶级道路和非资产阶级道路,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职责

[收稿日期] 2015-02-02

[作者简介] 林绪武(1972-),男,安徽庐江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①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是引导革命走上非资产阶级道路。彭述之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央的政策,一般说来区别不大”。但是,其他中央委员“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活动根本不同。”^{[1]90}一部分同志表示强烈反对和不赞成机会主义的中央和某些负责工作人员。实际是,党中央理解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首先应当实行民族革命,而后再谈社会主义革命,“民族革命的主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应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要帮助它建立政权”,蔡和森认为这“纯粹是机会主义的论调”^{[1]91},绝不能把“非资本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权”分开,无产阶级只有掌握革命领导权,才会引导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可见,机会主义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完全划成鸿沟”,“以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4]1036}。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内部“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5]247}此外,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很快就会向敌人妥协,“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5]277}这就表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北伐战争是国共双方争夺领导权的共同需要,但是,双方对北伐的目的和意图却完全不同,“对资产阶级说来,北伐只是争夺新地盘和巩固其领导地位的借口,以使革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则想利用北伐来发展工农力量,夺回领导权,以使革命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1]85}因此,“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5]331}

蔡和森在中共“五大”上就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发表了一段演说,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过去的弱点及现在的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而能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中共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做他们的尾巴”^{[1]97-98},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立场坚定,积极争取。而机会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悲观,“教我们让国民党以形式上的领导权”,“汪精卫等由悲观,硬向我们索实质上的领导权。”^{[1]107}这就表明,国民党认识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而“硬向我们索”,但党内机会主义却“让国民党以形式上的领导权”。对领导权的不同态度,是国

共双方的鲜明对比,体现党内机会主义政治上的幼稚和理论上的不成熟。

其次,指出了早期机会主义让步政策的错误,即“让步”论。这一错误既体现为对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让步,亦体现为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让步,还体现为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件,是争取革命领导权和对中共政策的试探,结果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采取让步政策,成为机会主义让步政策错误之始。北伐战争时期,党中央接连不断向蒋介石让步。蒋介石在湖南和湖北遭到失败,并失掉半数以上的黄埔军校学生时,蔡和森提出“难道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实行让步政策吗?”而中央却继续退让,并发出声明:“中共不拥护汪精卫,而拥护蒋介石。”^{[1]87}北伐战争之后,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特点是工农运动异常发展和高涨,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并退出革命队伍。这样,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军阀和帝国主义激烈斗争,而且要同资本家和地主殊死战斗。但是,党中央没有预见到新的革命时期的这一特点,继续实行让步政策,蔡和森说:“北伐越是向前推进,中央的政策就越是机会主义。”^{[1]86}

中共“五大”开幕前两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向帝国主义让步的政策和决议草案。他“援引列宁向帝国主义让步的教训”,肯定让步政策的必要,提出让步的方法主要是向外国商人让步,在武汉政府所辖区域内,保护外商有经营的自由,禁止民众一切非法行动,极力挽留外商,“利用外商去反对其本国帝国主义之武装干涉。”蔡和森说:“利用外商去反对其本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论,“一见便知道是很臭的机会主义的邪说”^{[1]103-104}。

中共“五大”召开前,中央局曾经开会讨论店员问题,陈独秀提出取缔店员要求的条例,认为店员问题非迅速解决不可。蔡和森发问:“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注意取缔店员?据我所调查,店员要求并未过火,上几个月增加的工资已被提高的物价超过了。”张国焘亦反对,因意见不一,此次会议讨论小资产阶级问题没有结果。蔡和森说:“实际上,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问题,在老鲍报告对帝国主义让步政策时已明示其端。”^{[1]105}因而,中央在武汉店员罢工中所采取的态度特别令人气愤,“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党和资本家的观点是一致的”^{[1]87},体现党中央向小资产阶级的让步。“五大”闭幕后,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做了一个政治报告,提出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问题,说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恶化,“现在只有两条出路,或是决裂,或是让

步。”^{[1]108}瞿秋白有一篇书面提议,是说明湖南农民问题引起的阶级分化的革命危机,主张土地革命暂以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等为条件,待有武力再实行没收土地,“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2]96}。

1927年6月4日,北伐攻下郑州后,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乐观的政治报告,共产国际代表鲁易指出情形并不允许乐观,认为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蔡和森赞成进攻论,说:“我们中央政治局,从今日起,必须具一种明确的意识:再也不要说甚么让步……今后我们的任务再也不要退让而只是进攻。我们应首先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2]81}。经过激烈的辩论,主张进攻的提议获得通过,但却引起党内惊慌、骇怪,“因为退让已成习惯……现在忽然有违反此心理与习惯的决定,所以莫不大惊大怪起来。这是证明机会主义入人之深”^{[2]81-82}。蔡和森也指出:“在一定范围内某几种退让手段是必要的”,但退让决不是政治上的主题,“政治上的主题是‘进攻’而不是‘退让’”^{[1]109}。他强调:“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然而,鲁易并没有真正坚持进攻的提议,“从此中央政治局遂永远不能超出退让政策的厄运”^{[2]82-83}。实际上,退让方针“已成为中央政治局唯一无二的总路线”^{[1]110}。

再次,指出了早期机会主义忽视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错误,即“回避”论。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引导革命走上非资产阶级道路的“主要方法是农民自己实行土地革命”^{[1]89}。鲍罗廷说过:“国民革命是要首先解决土地问题,若不解决土地问题,是不能够成功的,我们不要唱高调,我们应就实际问题着想——土地问题。”^[6]然而,面对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的行径,鲍罗廷又提出回避土地革命的问题。陈独秀说,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因而,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7]。显然,陈独秀不太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李大钊批判了忽视农民革命力量的错误,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故当估量革命

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8]824}。“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8]834}。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革命力量的科学认识,却没有为机会主义的中央所重视。

中共“五大”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央公开讨论没收土地的问题,参加会议讨论的谭平山节节退让,他和鲍罗廷、陈独秀商量后,提出所谓“政治没收”,即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以避免军官们的反对及所谓大地主标准难定之难题。“这个‘政治没收’显然是回避土地革命的表词。”^{[1]104}中共“五大”农民问题委员会开会讨论土地问题时,采用了政治没收的办法。回避土地革命,实际上是对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决议的违背。蔡和森说:“五次大会主要的任务便是接受国际决议,改正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政策,及根本的错误观念。”^{[1]96}也是在中共“五大”召开前夕,鲍罗廷提出湖南民众运动过火,不应直接收回海关、教堂及没收英美石油公司的财产,强调外交应由国民政府直接办理,“民众不得自由行动以促武装干涉之速来”^{[1]103}。同时,机会主义的中央害怕人民群众直接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1927年1月3日,人民群众夺回汉口英租界,“中央非常不满”,“严禁人民收回外界租界”^{[1]88}。蔡和森指出“外交官办,民众不得自由行动”论,同样“是很臭的机会主义的邪说”^{[1]104}。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和调查,则热情地予以歌颂,“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9]。因此,一方面,蔡和森批判了中央对农民及土地革命的机会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他赞同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而独立探索湖南土地革命的方向^{[1]141}。蔡和森认为从中共“五大”开始,革命的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而不是回避土地革命。“我们只有秉着五次大会‘进攻’的总方向,土地革命的总目标,以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正确政策,打破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首领的犹豫与动摇,坚决的领导革命一直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跑,这样则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109}然而,中共“五大”会后的第一个决议不是讨论怎样实行土地革命,而是决定怎样向地主阶级、革命军人和所谓小资产阶级让步。所以,中共“五大”的缺点之一是“没有征服机会主义首领的基本观念和思想”^{[1]98},机会主义得以继续其生命与发展。1927年7月12日,张国焘自从主持5人政治局及常委以来,“开始表现他政治上弱点,尤其怀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

想”。这是早期机会主义错误的表现,是导致南昌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直至党的“八七”会议,“公然的正式的承认了自己机会主义的错误……救出中国共产党于机会主义的破产之中”,但“八七”会议只是承认与改正机会主义错误的开始,“并不是这一次便完全肃清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遗毒在党内还是很深的”^{[2]102}。

此外,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在对待工农武装力量方面也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二 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危害

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诸多错误,不仅使党的领导和建设遭受危害,而且使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处于十分紧张和危急时刻。

一是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件。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召开之前,在讨论关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时发生争执,中共提出7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10]。中共中央做出妥协,一致同意4人参加。而在实际选举中,共产党员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不到三分之一,体现了机会主义的党中央向资产阶级的让步。“这时,让步妥协政策在中央已有发展,并巩固起来”^{[1]83}。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夺取领导权的“三·二〇”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广东的同志说:“当进攻而没有进攻”,中央说:“当退让而没有退让。”显示中央和广东的分歧。同时,中央认为拖延政策才是引起“三·二〇”事件的一个原因,而广东的同志却反对这一意见。所以,中央和广东之间一贯的分歧,“是党内在政治上的分裂的起因”^{[1]83-84}。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坚决反击蒋介石。但是,中央“被蒋介石气势汹汹的行动所吓倒,害怕造成分裂”^[11],提出以后对国民党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1]291}。

蒋介石称“三·二〇”事件是误会所致,蔡和森则明确指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五卅运动后加剧的阶级对抗和广东工农同资本家和地主激烈冲突的后果,而决不是蒋介石个人决定的结果”。这就表明蒋介石已充当资本家和地主联盟的代表,“绝不能把三月二十日事变只看作是偶然的、对中共的错误攻击”^{[1]83}。李立三强烈谴责党中央的让步“十足的表现了专一奴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精神”^{[1]291}。

二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在讨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时,中央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彭述之、罗亦农等坠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对这一决议作了机会主义的曲解,不重视决议提出资产阶级将要叛变革命的指示,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拉住资产阶级。瞿秋白批评了彭述之等机会主义的错误,对于机会主义有一定的攻击,然而,“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1]297}。

正如共产国际决议的预测,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和迫害了大批工人群众、共产党员。蒋介石对革命的叛变,是党内早期机会主义助长了他。蔡和森认为:“上级党机关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或暂时的现象,而是长期的一贯的政策。”“‘四·一二’的惨败,完全是这个政策造成的。”^{[1]88}然而,陈独秀和彭述之“否认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对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实行投降主义”^[12]。因此,中国革命遭遇了重大挫折而转入低潮。

三是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蔡和森在会上支持罗易对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进行批评,“西北学说——即机会主义的大系统,这一大系统是在五次大会之前成就和开始实行了的”^{[4]949}。蔡和森是会议的重要筹备人和大会秘书长,“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国际决议”,“对于中共五大贯彻共产国际的新决议起了重要作用”^[13]。

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1927年5月18日和20日,夏斗寅、许克祥分别在湖北、湖南叛变。面对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左派的公开暴动,蔡和森力主解决两湖问题,指出只有以暴动对付暴动,才能制胜一切敌人。然而,陈独秀仍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与左派的关系,对汪精卫集团采取避让迁就的态度,同样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与反对派的进攻作坚决斗争。因此,两湖的失败是早期机会主义放任夏斗寅、许克祥在肘腋之下长期发展导致的。蔡和森指出,在机会主义影响下,过去所拟的两湖决议案没有实行,过去所拟左派群众的工作被陈独秀斥责,过去所拟的发动群众攻击国民党中央反动的工作得罪了汪精卫,鲍罗廷和陈独秀遂对此进行指责,过去所拟的以进攻的政纲与国民党公开谈判的工作也没有实行。陈独秀、鲍罗廷等作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拉住汪精卫,但是这样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汪精卫表面上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际上他认为国共合作不能长久,“因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总不能永远合作在一起的”。之所以未与共产党立即决裂,是因为分共“时机未至”,但是,“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避免的”^[14]。蔡和森认为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假左派反革命计划早已确定,所犹疑的是用什么借口分共。然而,罗易仍然幻想拉住汪精卫,并让汪精卫看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五月指示,汪精卫感觉事态严重,分共的时机已经到了。罗易此举给了汪精卫是共产党企图破坏国民革命消灭国民党的借口,实行早已拟定好的分共图谋。7月15日,汪精卫便发动了背叛革命的政变。

三 克服和防止机会主义的举措

蔡和森指出,我们党尽管犯了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五卅”运动的胜利和北伐革命高潮的发展。虽然党的历史不过几年而仍处于幼稚的年代,然而我们已经超过欧洲工人阶级有百年或数十年政党的历史。这样幼稚的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斗争,错误在所难免。蔡和森分析了党内早期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防范之举。

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因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又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恰恰是割裂开来。蔡和森强调机会主义没有正确理解和执行列宁的殖民地民族问题的理论,不懂得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同时也要与之进行斗争。在同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中,只看到矛盾的统一性,没有看到矛盾的对立性,“这样所得的结论,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辩证法的?不是的”^{[4]940}。李维汉曾分析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原因时说:“未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15]这何尝不是党内早期机会主义错误的原因。

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因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不能把民主与集中分裂开来。“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党的指导机关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相应地吸收一些优秀的工农群众的领袖,党的指导机关不仅没有群众化,却逐

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是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来源。同时,党内没有群众的政治讨论,党员只是听从上级的指令,“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4]913}。党的指导机关与群众的联系松散,无异于使群众离开党,使党脱离群众,抛弃群众。这样的组织表面上看起来整齐严肃,里面却潜伏着很大的危机。此外,党内缺乏监督制度,党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工具,而上级指导机关却有超越纪律的自由,导致党内的正确意见无法发挥作用。“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是因为党不受群众的监督,“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16]287}。

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因为没有正确看待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有最革命的工农阶级,和最精华的工农党员群众”,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他们的倾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4]912}。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及政治倾向,却一度对党内造成深刻影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的特点,主要表现就是妥协退让。在同资产阶级合作时,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表现为低估自己的力量而高估资产阶级的力量,害怕同资产阶级发生分裂,面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一味地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来换取资产阶级不离开联合战线,可耻地出卖着自己的阶级和阶级利益,于是,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就不可避免。

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鲍罗廷、罗易是共产国际代表,他们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挥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在中国革命上的失误或错误,直接导致了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回避土地革命的北伐,向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让步”是西北学说的三大政策,西北学说是“中国革命第二次大失败的总因,也是五次大会前后新机会主义泉源”^{[1]109}。然而,鲍罗廷是西北学说的主要提出者,共产国际的责任在所难辞。西北学说实际是一种“逃跑主义”,充满了对于自己势力的悲观和对于敌人势力的恐怖,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利用军阀以制军阀的老政策。“对于中国革命是悲观的,过于估量东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不相信东南无产阶级的势力,认定东南无产阶级的势力也如太平天国或蒋介石一样不是失败便是投降,不是投降便是失败”^{[1]100}。因此,中国革命遭遇的重大

危机,国际负有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机会主义。鲍罗廷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2]97}。因而,中国共产党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难辞其咎。

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错误,对党和革命都造成严重的危害,克服和避免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关键。

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蔡和森指出,要克服机会主义的错误,就要肃清用唯心论分析方法产生的不正确的理论,必须铲除过去一切不好的遗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17]。坚决杜绝唯心论的分析方法,坚定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蔡和森说,真正的革命党,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4]807}。这就是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化、具体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4]916-917}。因此,中国共产党既需要不断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其立场、现点和方法,又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及其特点做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任务、目标及方法。

其次,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大力发展党内民主。要停止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在党内的指导工作,尽量地让工农群众参加党的指导机关,党的指导机关要由群众选举。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能笼统地反对,并不是过去负责工作的同志都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者,更不是要把一切犯过错误的同志逐出指导机关,而是要尽可能地把对党的改造的没有妨害的同志都利用到工作中来。要充分发扬党内的民主,加强党内讨论。指导机关要让群众了解党内的事情,过去的一切错误和是非都可以让群众进行讨论,不要压制群众的意见,坚决反对要抛弃或开除

“腐化”的下层群众的做法。“八七”会议指出:“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领导。”^{[16]290}同时,还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纪律是巩固党的组织的重要方式,以真正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代替机械的宗法的纪律。

再次,要加强党的改造,使党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蔡和森指出:“党开始形成时,分子当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同质的先进分子,纯粹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4]808}党的成立时间不长,受到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非无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影响难以避免,党要完全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党的改造不是随便撤换几个上级机关,也不是简单地由知识分子换成工人,而是需要从支部做起,从根本上肃清一切机会主义的遗毒,从根本上改变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把党改造成为一个伟大、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同时,对党的改造的长期性要有明确的认识,不能急于求成,也要认识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应当由全体党员来共同完成。

四 结语

蔡和森对党内早期机会主义的分析,对于认识党内早期机会主义产生、发展、破产的历史和反思党内早期机会主义错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由于“个人个性对许多问题非常简单化”,“最根本的是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来源于小资急进主义”,致使他在“组织方面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纠正到另一极端去了”^{[4]969}。同时,对陈独秀的批判“夸大了路线斗争,认为‘各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可能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18]。必须指出,党在早期所犯下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党的幼稚与不成熟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影响,而蔡和森所说共产国际决议“对于当时一切严重的问题,都有极正确的解答”^{[1]30},体现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具有神圣化和存在照搬的一面,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当然,囿于时代所限,我们不应苛责蔡和森对党内早期社会主义的认识,他留给党和人民的伟大的历史财富十分丰厚,他的不足仅是次要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值此蔡和森同志诞辰 120 周年之际,系统地梳理他对于党内早期机会主义认识的历史贡献,不仅是对这位伟大革命先烈的尊敬与缅怀,也是为了以史为鉴。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仍然要坚决克服“左”的

或右的错误的干扰,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 [2] 蔡和森.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 [3]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M]. 北京:三联书店. 1984;263.
- [4]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5]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6] 李玉贞.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109.
- [7]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 北京:三联书店. 1984;367.
- [8]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5-16.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613.
-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55.
- [12] 石仲泉. 周恩来同志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J]. 教学与研究,1981(2):10-15.
- [13] 李永春. 蔡和森与中共五大[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9 (1):69-73.
- [14] 汪精卫. 汪精卫集:第 3 卷[M]. 上海:上海书店 1992;222-223.
- [15] 李维汉. 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1983(3):47-91.
- [1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17]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67.
- [18]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6 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43.

“Explicit Marxism”: Cai Hesen’s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on Opportunism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arty

LIN Xu-wu, CHANG Hua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Cai Hesen, an important leader, theorist and propagandis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summarizes the history opportunism of the party earlier and analyzes its mistakes , harmness and causes. He upholds Marxism firmly, contributing to overcoming and avoiding the mistakes of opportunism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he whole party’s Marxist theory. History is the best textbook and sober agent.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e still have to draw experience from history to overcome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mistakes and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lidly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ai Hesen; opportunism of the party earlier; Chen Duxiu; marxism